朝鲜王朝官修《高丽史》对元东征日本的历史书写

孙卫国

(南开大学历史学院, 中国天津, 300350)

内容提要: 朝鲜王朝立国之初, 以编年体官修《高丽史》, 几经努力不果。世宗年间改纪传体, 编成 139 卷本《高丽史》, 以塑造朝鲜王朝的正统性。《高丽史》对元东征日本历史的书写, 强调高丽的自主性, 刻画高丽对元朝需索的巧妙周旋, 细致记录高丽所供给的粮草、人工等, 凡背叛高丽、投身元朝的高丽人, 都被称作“反人”而被列入《叛逆传》中, 体现宗藩关系下高丽追求自主意识的努力。在《忠烈王世家》与《金方庆传》中, 塑造了两个类似的元东征日本历史的版本, 高丽将领成为左右战场胜负的关键, 蒙古统帅的刚愎自用、一意孤行, 加上“大风雨”, 最终酿成东征的失败。对照《元史》与日本史书, 《高丽史》对元东征日本的书写极为偏颇。对涉及东亚三国的历史事件, 一定要摆脱“一国史”的局限, 而用“东亚史”的视角, 方能趋近历史的真相。

关键词: 《高丽史》; 元东征日本; 忽必烈; 忠烈王; 洪茶丘; 金方庆; 《叛逆传》; 历史书写

至元十一年(1274)和至元十八年(1281), 忽必烈两次派大军征讨日本, 乃近世东亚史上一件大事, 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。作为元朝藩国, 高丽王朝是东征日本的重要参与者。高丽王朝被迫为东征建造战舰、准备物资; 同时, 高丽军队也随元军征讨。检视朝鲜王朝官修郑麟趾《高丽史》中, 对这件历史事件是如何书写的, 既是考察高丽王朝在这次征讨中地位的重要史料, 也是检讨朝鲜王朝对这场战争认识的重要依据。《高丽史》有关这场战争的历史叙述, 散见于《元宗世家》、《忠烈王世家》、《兵志》、《金方庆传》等相关篇章中。尽管零散, 仔细分析, 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这场战争, 且透过分析战争中高丽如何巧妙地与元朝周旋, 具体而微地解剖元丽宗藩关系的特质。

一、朝鲜王朝官修《高丽史》的意图与历程

1392 年, 李成桂取代高丽幼主, 自立为王。为了尽快树立王朝的正统性, 一方面, 李成桂当即遣使明朝, 以“权知国事”的名义, 派韩尚质以“和宁”、“朝鲜”请国号于明朝, 积极谋求建立以明朝为宗主国的宗藩关系。明太祖朱元璋乃赐其国号为“朝鲜”, 李成桂君臣欣然接受, 通过箕子朝鲜接受周武王册封的传统, 来争取明朝天子的册封, 为其王朝获取宗主国的认同, 以确立其正统性。^① 同时, 立国之初, 李成桂就把编修高丽王朝史作为第一要务, 试图从本国历史中寻找新朝的合法性。诚如有韩国学者指出: “通过对高丽时期的整理, 指出高丽王朝存在的问题, 以此不仅可以体现为克服这些问题而建国的朝鲜的正当性, 还可以确定新统治理念的方向。”^② 就在这种政治诉求下, 朝鲜王朝开展了高丽史编纂。

最初以编年体为主, 展开编修事宜。太祖四年(1395), 李成桂令郑道传等人以高丽实录等史料为据, 纂成编年体《高丽国史》, 全书 37 卷。此书现已失传, 有论之曰: “采摭各朝实录, 及检校侍中文仁公闵渍《纲目》、侍中文忠公李齐贤《史略》、侍中文靖公李穡《金

^① 陈尚胜:《论朝鲜王朝对明朝的事大观》,《第三届韩国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,济南:山东大学出版社,1999年,第924页。

^② (韩)朴仁镐:《韩国史学史》,全莹、金锦子、郑京日译,香港亚洲出版社,2012年,第55页。

镜录》，汇而辑之。仿左氏编年之体，三年而成，为卷三十有七。顾其书，颇有舛误。至于凡例，以元宗以上，事多僭拟，往往有所追改者。”^① 此书成书虽快，但史料搜集有限，且当时以为对李成桂史实记载不真，“事多僭拟”，因而受到批评。不过，此书史论大多被《高丽史节要》采用，而得以留存，^② 也为随后高丽史的编纂奠定了基础。

太宗十四年（1414），太宗命春秋馆事河仑、卞季良等重修《高丽国史》，两年后河仑去世，重修被迫停止。世宗元年（1419），再令重修，三年（1421），书成，进献国王，世宗仍不满意。五年（1423），令卞季良、柳观、尹淮等继续改撰原来的史书，次年成《校讎高丽史》，因意见分歧，未能颁行。世宗十三年（1431），世宗令监春秋馆事申概、权蹊等编纂高丽史长篇，广泛采纳高丽史料。世宗二十四年（1442）八月，书成，名为《高丽史全文》。此书初印于世宗三十年（1448），史料相当丰富，但以编纂主旨不明，后亦停止颁行。不过，此书为以后《高丽史》和《高丽史节要》的编纂，准备了丰富资料。^③

最初几十年，朝鲜王朝官方为编高丽史，虽不遗余力，却并未编成一部满意的史书。世宗三十一年（1449），金宗瑞、郑麟趾等奉旨再次纂修《高丽史》，变编年体为纪传体，诚如《进高丽史笺》所言：“凡例皆法于迁史，大义悉禀于圣裁。避本纪为世家，所以示名分之重。”^④ 因为编年体并不利于王朝正统性的塑造，即便从太祖开国时开始纂修，历经数代，尽管编过几部史书，然无一令朝鲜国王满意，只得采用纪传体重编。“因为纪传体的记述，比编年体在对以往历史的批判性分析和构造性理解上，要更具有优势，而且这也更符合朝鲜统治者整理高丽时期史的意图。”^⑤ 文宗元年（1451）八月终于完稿。全书 139 卷，其中目录 2 卷、世家 46 卷、志 39 卷、年表 2 卷、列传 50 卷。接着，金宗瑞在纪传体《高丽史》基础上，用编年体改撰，次年二月，《高丽史节要》成，35 卷。这两部书终于实现了编纂前朝史以塑造王朝正统性的意图。

《高丽史》虽然用“世家”以载国王史实，以示名分，全书并没有用宋、元等中国皇帝年号，而是用高丽国王在位年为全书纪年方式，表明高丽王朝的相对独立性。其实，高丽立国以后，先后采纳过五代、宋、辽、金皇帝的年号。高丽元宗开始，行蒙古年号，忠烈王开始，行元朝年号，一直到被李成桂推翻。在高丽与中原王朝交往的岁月里，从文化上，高丽只臣服宋朝，但与宋朝宗藩关系持续时间最短，后来宗主国就先后被辽、金和元取代。对于这些游牧民族所建立的中原王朝，高丽王朝尽管政治和军事上不得不臣服，但文化心态上始终有着高昂的心态，并不臣服。朝鲜王朝官方修纂的《高丽史》，尽管国王用世家体裁，不用本纪，显示藩王的本色，但是全书不用中国皇帝年号，而是用高丽国王的在位年，作为纪年方式。这种折中办法，充分显示朝鲜王朝一种基本的认识：既承认高丽藩国的地位，但并不完全臣服，而有着一一种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。这两种意识的有机结合，构成了《高丽史》历史书写的基调。

高宗五年（1218），蒙古军队追击契丹遗民，进入高丽，开始正式与高丽接触。不久，缔结兄弟盟约，正式交往。但蒙古屡向高丽索取财物，引起高丽不满。有次蒙古使臣归国途中被杀，终于引发战争。从 1231 到 1258 年，蒙古出兵攻打朝鲜，竟有七次之多。高宗四十六年（1259），派太子王僖前往蒙古，双方议和。恰在此时，蒙古大汗崩逝，王僖亲迎忽必烈，忽必烈继位，建立元朝。不久，高丽高宗去世，忽必烈遣使将王僖送回高丽继位，是为元宗，开启了两国和平之路。正是从元宗时期开始，忽必烈在高丽帮助下，开始了征讨日本的准备。朝鲜王朝以高丽为中心进行历史书写，贯穿着整部《高丽史》，因而其对元东征日本的历史书写，乃呈现一个朝鲜王朝版本的“蒙古袭来”故事。

^① 《东文选》卷 93《进讎高丽史序》，汉城：庆熙大学出版社，1968 年。

^② （韩）朴仁镐：《韩国史学史》，第 55 页。

^③ （韩）朴仁镐：《韩国史学史》，第 57 页。

^④ 《东文选》卷 44《进高丽史笺》。

^⑤ （韩）朴仁镐：《韩国史学史》，第 56--57 页。

二、《高丽史·世家》对元东征日本战争之书写原则与史实选择

元东征日本之前，忽必烈派使臣前往日本，希望建立一种比较密切的关系，这个时期相当长。从一开始，高丽王朝几乎被迫成为元朝东征的马前卒。对于这个过程，《高丽史》尽力记述，字里行间，饱含着一种无奈又不甘的意识，显示高丽王朝在元朝高压下，试图寻求一种独立，以捍卫本国利益。以高丽王朝为中心，凸显其本国意识与本国立场，成为《高丽史》书写的最基本原则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。

第一，战争准备阶段，面对元朝无端要求，高丽被动应付，全面地予以叙述。

元宗七年（1266），在征讨日本之前，忽必烈派遣使臣，途经高丽，出使日本。因为高丽人赵彝告密，忽必烈知悉高丽与日本常通往来，于是派遣使臣黑的、殷弘前来，并带来诏书，令高丽必须派使臣陪同前往，威胁说若不听令，即其忠诚可疑。高丽无法，只得命枢密院副使宋君斐、侍御史金赞等与黑的等往日本。但这次使行并未到达日本，元宗八年（1267）正月，宋君斐、金赞与蒙古使节至巨济松边浦，畏“风涛之险，遂还”。元宗只得令宋君斐随黑的去元朝复命，并上奏皇帝。奏疏中表达着几层意思：第一，先对此次使行未能如期抵达日本，加以解释。认为风涛骇浪，极度危险，担心使臣安全；加上日本人“顽犷无礼义”，对于蒙古使臣的安全，难以保证，故而只能半途而废。第二，对于蒙古听信赵彝之言，以为高丽常与日本通好，予以辨白。特别强调“日本素与小邦未尝通好”，只是偶尔与对马岛人稍有贸易，对于其他日本人，则根本没有往来，故而赵彝之言不确。第三，自从元世祖即位以来，高丽就深受隆恩，并铭记于心，“圣恩天大，誓欲报効，如有可为之势，而不尽心力有如天日。”^①只期望能报之于万一。这是一篇表决心的奏疏，也是一篇为高丽开脱罪责自我辩白的奏疏，充满了外交辞令。蒙古第一次派通使日本，就这样落空了。可见，高丽当时对于此事，实在没兴趣，只是应付而已。

蒙古对高丽这种刻意推脱，非常清楚。八月初一，黑的、殷弘及宋君斐等再次来到高丽，并携来忽必烈的问罪谕旨。忽必烈在谕中，一针见血地指出高丽的推脱诡计，严词指责高丽敷衍塞责，不诚实，“天命难谏，人道贵诚，卿先后食言多矣，宜自省焉”，对高丽给予严重警告。进一步强烈表达他通使日本的决心，“以必得要领为期”，一定要有结果，否则不会善罢甘休。最后追问高丽“誓欲报効”的说法，^②明确点出当时正是报効之时！软硬兼施，高丽毫无办法，只得硬着头皮派使臣前往日本，充当东征日本的马前卒。

过了十数天，高丽国王元宗遣起居舍人潘阜赉元国书及高丽国王书去日本。元国书有曰：“高丽，朕之东藩也；日本密迹，开国以来，亦时通中国，至于朕躬，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，尚恐王国知之未审，故遣使持书布告朕志，冀自今以往，通问结好，以相亲睦。且圣人以四海为家，不相通好，岂一家之理哉！以至用兵，夫孰所好，王其图之。”^③忽必烈向日本表达一种通使往来的愿望，希望日本能够上表通好，“以相亲睦”。若置之不理，就要兴兵问候，以示威胁。同时，高丽亦给日本奉上国书，现身说法，将其对蒙古的看法，向日本表露，规劝日本向元帝国遣使称臣。可见，尽管元跟日本并没有往来，之前了解也不多，但忽必烈通过高丽国王，向日本传达通使往来的愿望，希望两国互通往来，以建立一种友好关系。高丽王国尽管并不大愿意充当媒介，但在蒙古帝国的高压之下，也没办法，只能将蒙古帝国忽必烈帝诏书送达日本，同时附上高丽国书，表达通使愿望。蒙古对日本派遣使节，传达善意，但日本并不予理睬。随后忽必烈又遣使节赵良弼，亲自前往。

可见，《高丽史》在《元宗世家》中，对于高丽在蒙古的威吓下，被迫遣使前往日本的史实，一一陈述出来。在史实陈述的背后，有种无奈与被动的感觉。字里行间，显示出蒙古

^① 郑麟趾：《高丽史》卷26《元宗世家二》，元宗八年正月癸丑。台北：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，1996年。

^② 《高丽史》卷26《元宗世家二》，元宗八年八月丙辰。

^③ 《高丽史》卷26《元宗世家二》，元宗八年八月丁丑。

帝国的威力，尽管并无评论，但从几份诏书中，元朝的威吓，相当明显。这是朝鲜王朝史官在书写这段历史时，所流露出来的厌恶情感。其实，通过高丽使节传话，只是先声，忽必烈对日本的遐想远不只是通使往来，就能满足的。

元宗十二年（1271）正月，“蒙古遣日本国信使秘书监赵良弼及忽林赤、王国昌、洪茶丘等四十人来”，^① 并带来忽必烈诏书，这是蒙古帝国通过高丽，派往日本的第一个使团，实际上分两批：第一批，以赵良弼为国信使，赵良弼又让高丽“幸臣”康允绍偕同前往；第二批忽林赤、王国昌和洪茶丘，将兵送到海上，作为后备使臣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洪茶丘原本是高丽人，因为其父投靠蒙古人，他也就成了蒙古将领。史料中特别提及，洪茶丘见到郊迎的高丽国王元宗“不拜”，^② 也就是不再向国王称臣。书中特别提及这个细节，充分显示洪茶丘的傲慢，也映衬出高丽君臣与朝鲜史官的不满。

因为日本对蒙古之通使要求不予理睬，蒙古开始用兵准备。军队未动，粮草先行。为了准备粮草，蒙古派忻都率兵前往高丽屯田，并要求高丽予以配合，准备三千头牛，并农器、种子之类备用。随之，蒙古遣殿中监郭汝弼前往蒙古上陈情表，对于蒙古所需之物，表示颇有困难，一一回绝，

承中书省牒，凤州屯田，农牛、农器、种子、军粮等事。若乃农牛，如前表奏，小邦京中鲜有畜使者，外方农民虽产之，饶者畜养亦不过一二头，贫者多以耒耨，或相赁牛而使之。今外方牛畜，悉因全罗道粮饷转输，以至饥困，损失者大半。农器，则小邦人民元来未有贍庀者，此皆虽不得如数，并当随力供办。种子，则百姓逐年耕作，以修贡赋用，其余以为粮料。……军粮，则大军之后，小邦元来蓄积，除逆贼攘夺外，悉因供亿留屯军马及追讨军马，罄竭无余。中外臣民征敛者累度，犹不连续，且又泛计种子、菽秣，接秋军粮凡几万硕，此则何从而致之耶！^③

高丽所上陈情表，可谓百般推诿，通篇都在讲其困难。《高丽史》对于这类陈情表，以及高丽如何应付蒙古之需索，成为其重点叙说之内容。朝鲜王朝史官在编此书之时，也是寄托着对宗主国明朝有着同样的情感。尽管明朝较之元朝，对待朝鲜王朝并没有如此般索取，但是明初连年的处女与火者的需索，宦官的来使，也使得当时朝鲜王朝疲于奔命，不堪其重负。^④ 故而在撰写《高丽史》时，对于这类史实着力叙述。既表达着作为藩国的无奈，也显示着藩国的抗争。尽管这种抗争并没有多大的成效，但是表达其并非逆来顺受，而是有自主意识。

陈情表不够，接着派断事官沈浑上表，继续请命，力图使忽必烈汗解除这种需索。有曰：
噫！此百姓皆是皇帝之百姓，乃此农牛、农器、种子一皆收夺，使失其业，则恐百姓决定饥死，其又在此者役烦力竭，不堪困苦。而从逆贼者，靡有歉艰，则焉知愚民有所贰于彼哉！圣鉴若知如此，必曰何不揆力陈实，早达宸所，使我百姓至于此极？然则谁当任其责？^⑤

从此表中看出，尽管表示高丽在尽力置办，想方设法满足需要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为百姓申诉苦楚，以为农牛、农器、种子都被收走了，百姓无以为生，只能干坐等死，或许因此而走向叛逆，可是“此百姓皆是皇帝之百姓”，相信皇帝也不愿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故而昧死陈情，让皇帝知悉高丽百姓的困境，实际上这是再次表达抗争。

元宗十三年（1272）正月，赵良弼从日本回到高丽，并带来日本使臣十二人。高丽元宗国王马上派使臣前往大都报告，上表祝贺。同年十二月，元复遣赵良弼往日本招谕，这次却不如第一次顺利，元宗十四年（1273）三月，赵良弼到日本大宰府，不得入国都，只得再次回到高丽。在蒙古派使臣前往日本之同时，蒙古大军在忻都、洪茶丘的指挥下，截止元宗十

^① 《高丽史》卷 27《元宗世家三》，元宗十二年正月己卯。

^② 《高丽史》卷 27《元宗世家三》，元宗十二年正月己卯。

^③ 《高丽史》卷 27《元宗世家三》，元宗十二年三月丙寅。

^④ 有关此问题，参见[美]陈学霖：《明代人物与传说》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，1997年。

^⑤ 《高丽史》卷 27《元宗世家三》，元宗十二年三月丁巳。

四年（1273）四月，先后攻占了三别抄所占的朝鲜半岛东南沿海诸岛，珍岛、耽罗先后平定，扫清了障碍，为征讨日本作准备。对于征讨经过，《忠烈王世家》予以简略的叙述。

有鉴于第一次征讨日本前，高丽只是被动应对元朝的需求，在第二次征讨前，高丽国王主动出击，试图参与其决策过程，尽可能限制蒙古将领权限及其对高丽的侵扰。第二次征讨日本决策之际，高丽忠烈王正在大都，亲受谕旨。《高丽史》在叙述决策过程中，如斯写道：

王以七事请：一以我军镇戍耽罗者，补东征之师；二减丽汉军，使阁里帖木儿益发蒙军以进；三勿加洪茶丘职任，待其成功赏之，且令阁里帖木儿与臣管征东省事；四小国军官皆赐牌面；五汉地滨海之人并充梢工水手；六遣按察使廉问百姓疾苦；七臣躬至合浦阅送军马。^①可见，高丽国王对参与东征之事，非常重视，他先让大臣上奏，要入朝亲受东征之旨，

不想由其他朝臣传旨，以争取主动。对于排兵布局，忠烈王提出他的七点见解，直接参与决策过程，这是高丽国王变被动为主动的一种努力。从他所提出的七点建议看，一方面希望少用汉军和高丽军，多用蒙古军队，甚至于水手都希望多用汉地之人，不要专门依靠高丽水手，以减少高丽王朝的责任；二则削弱洪茶丘的权限，别加其职位，因为洪茶丘是其死敌。与此同时，忠烈王希望由阁里帖木儿与他共同掌管征东事项。忠烈王这么做，意图十分明显，就是不希望在这过程中，受制于人，更不希望因为这次出征，让政敌再次掌权而影响高丽国政，所以他要争取主动。《高丽史》也着重对此叙述。尽管忽必烈并未采纳忠烈王之建议，但还是重视他的建议。九月丙辰，征东元帅府镇抚也速达赉二关字来，专为约束蒙古征东军队的：“其一……据本国见管粮储船只梢工水手，一切军须，请照验行下合属，如法准备，听候区用，勿值临时失误。其一，经行去处，窃恐不畏公法之人，放火烧草，事系利害，请照验行下合属，出榜禁约，如违，罪有所归。”^②这两条约束，可以说是对忠烈王所提七条建议的回应，免得征东将领胡作非为，伤害高丽。尽管在《高丽史》中，对蒙古东征军之危害，没有详述，但从忠烈王在第二次东征之前的积极努力，可以看出，为了避免东征军的危害，忠烈王争取积极主动，终于获得回报。

可见，《高丽史》对在战争准备阶段，高丽王朝如何从被动应对，巧妙周旋，极陈困难，到第二次征讨前，高丽国王主动出击，争取主动，给予了系统书写。从中体现高丽王朝对于宗主国元朝的敷衍与抗争，从而凸显高丽王朝争取独立自主的意识。

第二，战争前后，高丽所耗费的人工、粮食、马料，给高丽带来诸多困难，《高丽史》则予以详述。

诚如前面提到，高丽对元朝各种需索，采取敷衍应对的办法，《高丽史》试图写出高丽的无奈。而对于高丽所耗费各种物资，面临的各种困难，为元征日本所造船舰，耗费人工、粮食、马料，不厌其详地加以叙述，充分显示高丽为元征日本，所付出的代价。即如：“（元宗）十五年春正月，元遣总管察忽监造战舰三百艘，其工匠役徒一切对象，全委本国应副……兴役催督甚严……于交州道各为部夫，使征集工匠役徒三万五百余名，起赴造船所。是时，驿骑络绎，庶务烦剧，期限急迫，疾如雷电，民甚苦之。”^③元宗十五年（1274）二月甲子，高丽国王就派遣别将李仁前往元朝汇报准备情况，将他们所做事情，所耗粮饷，事无巨细，一一上奏，特别表明高丽所面临的困难，百姓因之更加穷困，最后恳求“岁令供给，罔有期限，将无奈何！兹实悯焉！乞皆蠲免，以惠远人”^④，只求减免，以苏民力，以解民困。

高丽常常跟元朝算经济账，对于他们所提供的粮草数目，时时向元朝禀报，一笔一笔地算清。忠烈王三年（1277），高丽遣使上书中书省，其中有言：“小邦自至元七年以来，征讨

^① 《高丽史》卷29《忠烈王世家二》，元宗六年八月辛卯。

^② 《高丽史》卷29《忠烈王世家二》，忠烈王六年九月丙辰。

^③ 《高丽史》卷27《元宗世家三》，元宗十五年正月。

^④ 《高丽史》卷27《元宗世家三》，元宗十五年二月甲子。

珍岛、耽罗、日本大军粮饷，悉于百姓科收，尔后见在合浦镇边军、耽罗防护军、盐白州归附军并阔端赤，一年都支人粮一万八千六百二十九石二斗，马牛料三万二千九百五十二石六斗，皆以汉斗计。亦于百姓科收，今者所遣屯田军三千二百并阔端赤等粮料，更于何处索之！”^① 特别提及以汉斗记，可见，高丽是多么在乎这些粮草。这是在第一次东征时，高丽所筹集的粮草。《兵志》更详细叙述了为第二次东征，筹集军粮所采取的办法，真可谓费尽心机。

忠烈王三年（1277）二月，令诸王百官以至庶民，出米有差，以充洪茶丘军粮。……八年（1282）四月，东征所支兵粮十二万三千五百六十石。九年（1283）二月，命各道禄转未输京者悉充军粮。三月，令诸王百官及工商奴隶僧徒出军粮有差：诸王、宰枢、仆射、承旨，米二十石；致仕宰枢、显官三品十五石；致仕三品显官、文武四五品十石；文武六品、侍卫护军八石；文武七八品参上解官六石；东班九品参外副使校尉南班九品四石；正杂权务队正三石；东西散职业中僧一石；白丁抄奴所由丁吏诸司下典独女官寺奴婢十斗；贾人大户七石；中户五石；小户三石。唯年七十以上男女勿敛。^②

这段史料记录高丽王朝为筹集军粮，不得不采取的办法。第一，从这段史料可知，第二次东征日本期间，为了筹集军粮，高丽王朝上至国王，下至贩夫走卒，都必须筹集定量的军粮，以保证前线军需。第二，充分说明，征讨日本，给高丽社会带来全方位的损害，几乎无人可逃。第一次征讨之前，蒙古军队来高丽军屯，生产粮食，可以给高丽减轻军粮的负担；第二次出征之前，并没有再行军屯之事，高丽王朝只得全民动员，人人贡献。第三，《高丽史》特别在《兵志》中，将筹集军粮的问题，予以陈述，亦可印证在《世家》部分，对于军粮等物资供应的细致叙述，充分说明对这部分史实的关注，有其必要性的。

《高丽史》卷 29《忠烈王世家二》忠烈王六年（1280）十月戊戌条，特地收录一份元中书行省移牒，转录东征军事牒，主要探讨士卒逃亡事故及其处置办法，篇幅极长。较之叙述征讨日本的战事经过，长不止数倍，这一方面说明这是件大事，同时也反映朝鲜王朝修史官一种特别的心态，似乎有些幸灾乐祸。六年十一月，再上书中书省，汇报准备情况，曰：“小国已备兵船九百艘，梢工水手一万五千名，正军一万名。兵粮以汉石计者十一万，什物、机械不可缕数，庶几尽力，以报圣德。”^③ 详述各项准备事项，向皇帝表忠心，也是一篇极长的表文。这一卷中，将这两个极长的表文收录，表明高丽为征讨日本所作的努力和付出的代价。在朝鲜王朝修史官看来，元征高丽，如果没有高丽的准备与付出，大概也是不可行的。尽管东征日本，高丽只是附属帮衬，但对于其社会的影响则是深远而全面的。

第三，《高丽史·忠烈王世家》对两次元东征日本经过，叙述简略，且所记史实以高丽将领为中心。

至元十一年（1274）十月，元丽联军第一次征讨日本，日本称之为“文永之役”。《高丽史·忠烈王世家》，叙述此次战争，只有数行，如斯写道：

冬十月乙巳，都督使金方庆将中军，朴之亮、金忻知兵马事，任恺为副使；金侁为左军使，韦得儒知兵马事，孙世贞为副使；金文庇为右军使，罗裕、朴保知兵马事，潘阜为副使，号三翼军。与元都元帅忽敦、右副元帅洪茶丘、左副元帅刘复亨，以蒙汉军二万五千、我军八千、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、战舰九百余艘征日本，至一歧岛，击杀千余级，分道以进，倭却走，伏尸如麻，及暮乃解。会夜大风雨，战舰触岩崖多败，金侁溺死。^④

至元十八年（1281），元朝第二次东征，日本称之为“弘安之役”。对于此次征讨日本的

^① 《高丽史》卷 28《忠烈王世家一》，忠烈王三年二月丁卯。

^② 《高丽史》卷 82《兵志二》。

^③ 《高丽史》卷 29《忠烈王世家二》，忠烈王六年十一月己酉。

^④ 《高丽史》卷 28《忠烈王世家一》，即位年十月乙巳。

经过，《高丽史·忠烈王世家》也只有寥寥数行字，其曰：

七年五月戊戌，忻都、茶丘及金方庆、朴球、金周鼎等以舟师征日本。癸亥，行省总把报：是月二十六日，诸军向一歧岛，忽鲁勿塔船军一百十三人、梢手三十六人，遭风失其所之。遣郎将柳庇告于元。六月壬申，金方庆等与日本战，斩首三百余级；翼日复战，茶丘军败绩，范文虎亦以战舰三千五百艘、蛮军十余万来会，值大风，蛮军皆溺死。八月己卯，别将金洪柱自合浦至行宫，告东征军败，元帅等还至合浦。是月，忻都、茶丘、范文虎等还，元官军不返者，无虑十万有几。十一月壬午，各道按廉使启：东征军九千九百六十名、梢工水手一万七千二十九名，其生还者一万九千三百九十七名。^①

综合这两段史料，可知几点：

第一，叙述相当简略，充分说明《高丽史·忠烈王世家》对于这次征讨日本的战争，并不重视；或者说，叙述战争经过，并非其关注的重点历史事件。

第二，在如此简单的叙述中，其内容选择值得关注，重点介绍高丽军队的将领以及建制情况。首次东征，高丽军队尽管只有八千人，但是分左、中、右三路，各有将领指挥，对于元军将领，一笔带过。尽管从人数上看，高丽军队是绝对的少数，但在《高丽史》的叙述中，却是主要关注的对象。第二次东征的叙述，依然是以高丽将领优先，既点出了随军征讨高丽将领的名字，书中所记录唯一一场胜仗，还是高丽将领金方庆所指挥的高丽军队，斩首三百级。对于元军战事情况，未提一场胜仗，只述其败仗。在所提及的军队中，以“蛮军”称范文虎所率领的蒙古军队，表达一种蔑视情绪。

第三，具体战事情况，叙述极其简略，两次战败，都提及了“大风”。首次东征，“至一歧岛，击杀千余级，分道以进，倭却走，伏尸如麻，及暮乃解。会夜大风雨，战舰触岩崖多败”。征日本，先胜后败，夜晚败于“大风雨”，也就是日本所谓的“神风”。第二次则曰“遭风失其所之”，“值大风，蛮军皆溺死”。一定程度上，说明了东征失败的直接原因。

第四，两次战争的叙述，都提及了具体的损失。首段史料中，除提及战舰败没外，特别提及左军使“金侁溺死”，这是高丽溺死的最高指挥官。而在随后的《年表》中，则曰：“十月，金方庆与元元帅忽敦、洪茶丘等征日本，至一歧战败，军不还者万三千五百余人。”^②。第二段史料对于元军伤亡情况，有多个数据，十分清晰地呈现出东征伤亡之惨重。在下文《年表二》中则曰：“元至元十八年，忠烈王七年五月，金方庆与忻笃（都）、茶丘征日本，至霸家台战败，军不还者十万有奇。”^③这与第一次征讨的叙述类似，字数不多，叙述简略，但是丝毫不掩饰其漠视的态度。

可见，从《高丽史·忠烈王世家》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当中，高丽军队是主角，蒙古军队只是配角，日本海战作为背景而已，充分显示《高丽史》的主体性意识，并非全面叙述这场战争，而是揭示高丽军队在其中的作用，是一种选择性的历史书写。

三、《高丽史》对元东征战争中高丽将领传记之书写

纪传体史书，人物是中心；各种历史事件的叙述，也都贯彻到人物传记之中。高丽参与这场战争的将领，《高丽史》中有专传的人不多，主要有《金方庆传》，其子金忻付传、部将朴球付传；《金周鼎传》、《罗裕传》；金文庇传付《李贞传》。另外，一些相关人物如李藏用、洪福源、赵彝有传。在这些传中，比较详细讨论了这次战争的是《金方庆传》，其他人物的传，对这场战争一笔带过，甚至未曾提及。根据人物生前表现，有正面叙述的，如《金方庆

^① 《高丽史》卷 29《忠烈王世家二》。

^② 《高丽史》卷 87《年表二》。

^③ 《高丽史》卷 87《年表二》。

传》；有反面典型的，如赵彝与洪福源都被列入《叛逆传》中。可见，《高丽史》对这些人物的选择与书写，都是有着强烈政治诉求的。

《高丽史》中《叛逆传》有六卷。序曰：“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尤严于乱臣贼子及据地以叛者，其诛死者而不贷，所以戒生者于后也。夫人臣忠顺，则荣其身，保其宗，而美名流于后；叛逆者未有不脂润鼎镬，赤其族而覆其祀者，可不戒哉！作《叛逆传》。”^①《高丽史》中，对于那些投靠元朝、危害高丽之人，大多列入《叛逆传》中，东征将领中以《洪福源传》与《赵彝传》为代表。赵彝“中进士，后反，入元称秀才，能解诸国语，出入帝所”。他并未率兵前来高丽征讨，《高丽史》中所记，只是他向忽必烈进言：“高丽与日本邻好，元遣使日本，令本国乡导。”这才导致高丽派使臣宋君斐陪同元使前往。后来又有几次进“谗言”，故而《高丽史》曰：“彝常以谗毁为事，竟不得志而死。”乃是以言辞加害高丽，《高丽史》对这类人予以贬斥，“有金裕、李枢者，亦反人也。”^②列之于《叛逆传》，称之为“反人”。可见，朝鲜王朝史官们有多痛恨这些卖身求荣的家伙。

洪福源，乃洪茶丘之父，亦被列入《叛逆传》中。《高丽史》中无洪茶丘传，在《洪福源传》中，对洪茶丘所干事多有记述。洪福源原本为高丽西京郎将，高宗二十年（1233）起兵反宣谕使郑毅，失败后，逃到蒙古。“福源在元为东京总管，领高丽军民，凡降附四十余城民皆属焉。谗构本国，随兵往来……然自是元兵岁至，攻陷州郡，皆福源导之也。”后洪福源得罪高丽人质永宁公綽之蒙古妃子，被处死。“籍没家产，械其妻及子茶丘、君祥等以归。福源诸子憾父之死，谋陷本国，无所不至。”^③元宗二年（1261），忽必烈即位后，才为洪福源雪冤，并令洪茶丘袭其父职“管领归附高丽军民总管”，此后洪茶丘一直担任元朝官职，因为他来自高丽，高丽相关事务，元朝大多委托洪茶丘办理。洪茶丘对高丽从不顾恤，处处与高丽为难，高丽君臣恨之入骨。

高丽国王忠烈王对于洪茶丘相当忌惮，他曾亲自向忽必烈进言，希望将洪茶丘召回元朝，不能留置高丽。“然茶丘在焉，臣之为国，不亦难哉！如茶丘者，只宜理会军事，至于国家之事，皆欲擅断。……上国必欲置军于小邦，宁以鞑鞑汉儿军，无论多小而遣之，如茶丘之军，惟望召还。”^④在忠烈王看来，洪茶丘肆意干涉国政，独断专行，使得他无以为政，故亲自向皇帝进言，希望将他调回。忽必烈提醒国王有关事项，忠烈王斥之为“茶丘之妄言”，忽必烈只好说：“非惟茶丘，人多言之。”忽必烈问“忻都如何”，忠烈王曰：“忻都，鞑鞑人也，可则可矣。使茶丘在，则与高丽军妄构是非，虽忻都不能不信，望令茶丘与高丽军皆还于朝，以鞑鞑汉儿军代之。”^⑤可见，忠烈王宁可让鞑鞑人忻都取代洪茶丘，也不让他在高丽搬弄是非。高丽国王与洪茶丘是水火不容的。其时，洪茶丘镇守耽罗，于是忽必烈下令，将忻都与洪茶丘等皆召回，免生事端。高丽趁此机会，接管耽罗镇守任务，也进而将耽罗置于其控制之下。东征期间，“（先是），以茶丘为监督造船官军民总管。茶丘克期催督甚急，分遣部夫，使征集工匠，诸道骚然。帝又命茶丘提点高丽农事，又命为东征副元帅。茶丘以忠清道梢工水手不及期，杖部夫，使大将军崔沔以大府卿朴暉代之。”^⑥这段史料虽涉及元征高丽之事，主要是讲洪茶丘借战事而危害高丽之种种罪行。他虽是东征副帅，却祸害高丽，比之达鲁花赤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尽管没有给洪茶丘单独立传，洪福源传中，已清楚交代了洪茶丘的所作所为。本传所述之元征高丽，只是作为说明洪茶丘所作所为的时代背景而已。尽管对于洪茶丘，已将他视作元朝人，在《叛逆传》中叙其事，将他视作叛逆。与赵彝被归入《叛逆传》一样，是朝鲜王朝史官为高丽王朝抒发着一种批判的情感，对于那些投靠元蒙帝

^① 《高丽史》卷 127《叛逆传一》序。

^② 《高丽史》卷 130《叛逆四·赵彝传》。

^③ 《高丽史》卷 130《叛逆四·洪福源传》。

^④ 《高丽史》卷 28《忠烈王世家一》，忠烈王四年七月甲申。

^⑤ 《高丽史》卷 28《忠烈王世家一》，忠烈王四年七月甲申。

^⑥ 《高丽史》卷 130《叛逆四·洪福源传》。

国的高丽人，《高丽史》一律斥之为“反人”，归之入《叛逆传》。

与把洪福源、赵彝被列入《叛逆传》相对照，金方庆则是作为正面肯定的对象。金方庆官至兵部尚书翰林学士。在两次东征日本过程中，金方庆都任高丽军队最高统帅，在其传中，对两场战争给予了较多篇幅。第一次东征，《金方庆传》述曰：

（元宗）十五年，帝欲征日本，诏方庆与茶丘监造战舰。造船若依蛮样，则工费多，将不及期，一国忧之。方庆……用本国船样督造。是年元宗薨，忠烈即位，方庆与茶丘单骑来陈慰，还到合浦，与都元帅忽敦及副元帅茶丘、刘复亨阅战舰。方庆将中军，朴之亮、金忻知兵马事，任恺为副使，枢密院副使金侁为左军使，韦得儒知兵马事，孙世贞为副使；上将军金文庇为右军使，罗佑、朴保知兵马事，潘阜为副使，号三翼军，忻即绶也。以蒙汉军二万五千、我军八千、梢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、战舰九百余艘，留合浦以待女真军，女真后期。乃发船入对马岛，击杀甚众。至一歧岛，倭兵陈于岸上，之亮及方庆壻赵扑逐之，倭请降，复来战。茶丘与之亮、扑击杀千余级，舍舟三郎浦，分道而进，所杀过当。倭兵突至，冲中军，长剑交左右方庆如植，不少却，拔一啣矢，厉声大喝，倭辟易而走。之亮、忻、扑、李唐公、金天禄、申奕等力战，倭兵大败，伏尸如麻。忽敦曰：“蒙人虽习战，何以加此！”诸军与战，及暮乃解，方庆谓忽敦、茶丘曰：“兵法：千里县军，其锋不可当，我师虽少，已入敌境，人自为战，即孟明焚船淮阴背水也，请复战。”忽敦曰：“兵法小敌之坚，大敌之擒，策疲乏之兵，敌日滋之众，非完计也，不若回军。”复亨中流矢，先登舟，遂引兵还。会夜大风雨，战舰触岩崖多败，侁堕水死。到合浦，以俘获器仗献帝及王，王遣枢密副使张镒慰谕，命方庆先还，加上柱国判御史台事。^①

第二次征讨情况，《金方庆传》如斯写道：

七年三月，出师东征。方庆先到义安军阅兵仗王至合浦，大阅诸军。方庆与忻都、茶丘、朴球、金周鼎等发，至日本世界村大明浦，使通事金贮檄谕之。周鼎先与倭交锋，诸军皆下与战，郎将康彦（康师子）等死之。六月，方庆、周鼎、球、朴之亮、荆万户等与日本兵合战，斩三百余级。日本兵突进，官军溃，茶丘弃马走，王万户复横击之，斩五十余级，日本兵乃退，茶丘仅免。翼日复战，败绩。军中又大疫，死者凡三千余人。忻都、茶丘等以累战不利，且范文虎过期不至，议回军，曰：圣旨令江南军与东路军必及，是月望会一歧岛，今南军不至，我军先到数战，船腐粮尽，其将奈何？方庆默然。旬余，又议如初。方庆曰：奉圣旨，赍三月粮，今一月粮尚在，俟南军来合攻，必灭之。诸将不敢复言。既而，文虎以蛮军十余万至，船凡九千艘。八月，值大风，蛮军皆溺死，尸随潮汐入浦，浦为之塞，可践而行。遂还军。^②

这两段史实书写，清晰地呈现了东征战场另一个版本，有几个特点：第一，有关元东征作战史实的叙述，这是《高丽史》中最详细的版本，较之《忠烈王史家》的叙述，更为详细，增加了许多细节，也更为形象。这段历史书写，以金方庆为中心，意在凸显金方庆的战功及其英勇事迹，故金方庆是中心，叙述其言行，揭示他在这场战争中的所作所为，构成本版本的主线。诚如前面所提到的，金方庆是高丽名将，出身名门，战功赫赫。而这两次战争中，金方庆的表现，充分说明金方庆是位英勇善战的栋梁之才，值得倚重。

第二，从这段史料中看，金方庆似乎是战争的主宰，第一次战斗正酣之际，金方庆“拔一啣矢，厉声大喝，倭辟易而走……倭兵大败，伏尸如麻”，甚至蒙古主帅也称赞他“蒙人虽习战，何以加此”！在战事有利之时，他建议乘胜追击，惜不被采纳，以至于遭遇风暴，战舰损坏败没，因而大败。第二次征伐之时，也是金方庆指挥的高丽军队，“斩三百余级”，取得一场胜仗。蒙古军队则屡打败仗，洪茶丘甚至仅以身免，最终“值大风，蛮军皆溺死，

^① 《高丽史》卷104《金方庆传》。

^② 《高丽史》卷104《金方庆传》。

尸随潮汐入浦，浦为之塞，可践而行。”可见，战斗何等惨烈！用这样强烈的对比法，以凸显金方庆的战功。

第三，这段史料与《高丽史》其他史料一样，给人呈现的是高丽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，如果只看《高丽史》，我们并不能全面掌握战事的情况，只是朝鲜王朝官方所塑造的高丽军队的表现而已，这种表现颇有夸大甚至故意塑造之嫌。事实上，抛开这些史料的片面书写，而从战事的角度来考虑，这场战争是元朝发动的，高丽被迫随从，高丽军队只能是辅助而已，不可能成为战争胜负的主宰。因此，《高丽史》某些情节不可避免的被夸大，甚至是杜撰的。即如金方庆与主帅的对话，就很难说是真实存在的。作为朝鲜王朝编纂者，固然不可能听到这些对话，即便高丽王朝留下的档案资料，也不大可能有这样的对话记录，因而可以说，这是一种合理的想象，从而增加金方庆在这场战争中的重要性，给他的表现添上一些耀眼的光环。《高丽史》中的相关叙述，这样的光环或多或少存在。

综上所述，《高丽史》以是否忠于高丽作为判定人物的标准。凡是背叛高丽，投身元朝，即便高丽是元朝的藩国，这些人物就被视作“反人”，而被打入《叛逆传》中，赵彝、洪福源就是典型代表。金方庆是东征日本时高丽的级别最高的将领，他是高丽东征的代表人物，被塑造成英雄典范。在他的传记中，以金方庆为中心，朝鲜史家展开合理的想象，通过金方庆的对话，为蒙古东征塑造了一个更为生动的版本，金方庆被塑造成为东征战事的主宰，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人物。蒙古将领则是失败的化身，对东征失败要负主要责任。

四、结语

朝鲜王朝官修《高丽史》，对于元东征日本的历史，在《忠烈王世家》与《金方庆传》中，呈现出两个相似而又有细微差别的版本。其基本主旨是相同的：凸显高丽王朝在这场战争中的贡献，宣扬高丽将领的战功。给我们呈现的是，高丽似乎是这场战争胜负的关键，只因元朝统帅一意孤行，不听高丽将领的忠言，以至于遭大风雨而败。诚如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·德·塞尔托所表述的：官方的历史书写，是由国家理性来完成的。“它要依据一些现成的材料，通过专门手法，来‘处理’某个‘环境’下的各种因素，以构建缜密的叙述。”^①因此这一版本是朝鲜王朝官方史家所构建出来的，它与明朝所修《元史》和日本相关史书的叙说，一定有着天壤之别。

如果将《高丽史》与《元史》两相对比，我们会发现有很大不同。即如所谓洪茶丘诬陷金方庆案，《高丽史》载：金方庆有功得赏，随之受到朝中党人排挤，被诬告欲谋反，“（洪）茶丘与本国有宿憾，欲伺衅嫁祸，闻方庆事，请中书省来鞫。”^②洪茶丘百般迫害，试图置之于死地，金方庆受尽折磨，忽必烈过问后，才将金方庆莫须有的罪名去除。《元史·高丽传》则曰：“十四年正月，金方庆等为乱，命愷治之，仍命忻都、洪茶丘饬兵御备。”^③此传是将金方庆视作叛乱，而《高丽史》中，将金方庆之事说成是洪茶丘的诬陷，有着绝然相反的看法。《高丽史》与《元史》，许多事情的记述相左，金方庆案件即是一个典型事例。金方庆在《高丽史》中，乃作为重臣而有传，《元史》则是将其视作叛乱嫌疑者。洪福源在《元史》中，被视作功臣，《高丽史》中则被收入《叛逆传》中。

如此巨大的差别，不能不引起我们警觉。对于如何处理这样一个涉及东亚三国的历史事件，如何避免这样的问题，或者说如何分析过去史书中刻意的构建，就不能只从一国立场和视角来评判历史。^④史料上，既要如陈寅恪所说的“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

^①（法）米歇尔·德·塞尔托：《历史书写》，倪复生译，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11页。

^②《高丽史》卷104《金方庆传》。

^③《元史》卷208《外夷一·高丽》，第4620页。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6年。

^④葛兆光在《在“一国史”与“东亚史”之间：以13—16世纪东亚三个历史事件为例》（《中国文化研究》2016年冬之卷）指出，“如果仅仅站在一国历史的立场、角度和视野来观看发生在东亚的历史，会出现‘死

正”^①，更重要的是，立场上，更要跳出国族的窠臼，摆脱一国史的羁绊，采取东亚史的视角，方有可能趋近历史的真相。

角’或‘盲点’。”因此，要舍弃一国史的视角，而从东亚史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些历史事件。

^① 陈寅恪：《王静安先生遗书序》，参见许冠三：《新史学九十年》（长沙：岳麓书社，2003年），第83页。